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6.015

日本战时言论统制机构“内阁情报委员会”研究 ——基于日方解密档案

范晓露¹, 董翊宸²

(1.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设置情报委员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实现言论统制“一元化”的重要手段, 该委员会成立于全面抗战前一年, 并在卢沟桥事变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与情报收集活动, 其调查内容与日本对外宣传方针的形成密切相关。伴随着侵略战争的步步扩张, 经由“时局同志会”而“内阁情报委员会”, “内阁情报部”而“内阁情报局”之变迁, 其最终发展成一个集情报收集、媒体管控、舆论引导为一体的战时言论统制机构。

关键词: 内阁情报委员会; 舆论调查; 情报收集; 对外宣传; 言论统制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6-0111-08

引用格式: 范晓露, 董翊宸. 日本战时言论统制机构“内阁情报委员会”研究: 基于日方解密档案[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6): 111-118.

A Research on the Cabine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 Wartime Speech Control Organization in Japan Based on Japanese Declassified Archivers

FAN Xiaolu¹, DONG Yichen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Setting up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Japanese militarism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speech control. The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one year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and conducted large-scale public opinion poll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Lugouqiao Incident. Its investigation cont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Japan's external publicity policy. With the step-by-step expansion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through the changes of "Comrades' Associ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Cabine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Cabinet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and "Cabinet Intelligence Bureau", it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a wartime speech control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media control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words: Cabine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public opinion poll; intelligence gathering; external publicity; speech control

收稿日期: 2020-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馆藏侵华时期各国新闻舆论集研究(1931—1945)”(17CZS033)

作者简介: 范晓露(1983—), 女, 广西柳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化;
董翊宸(1987—), 男, 陕西咸阳人, 陕西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

卢沟桥事变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影响,近代史学研究已有深入探讨,但关于日方情报及宣传工作的诸多细节则很少有研究涉及。2015年1月,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对外公布了一批来自旧日本政府内阁情报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期间的公文档案。其资料及编号包括:《各種情報資料・主要文書綴一》(A03025355700)、《各種情報資料・主要文書綴三》(A03025363400)、《北支事变関係情報綴一至四》(A03023869300—A03023917300)、《支那事变に関する各国新聞論調概要》(A03023912900—C11110768800)等。日本作为侵略战争的发起者和直接责任方,其原始文献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从分析这批解密材料入手,尝试归纳二战前后日本情报及对外宣传工作的策略和重心,并对其主导机构——内阁情报委员会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期展示其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运转提供一鲜活样本。

一 情报委员会对卢沟桥事变的巨量舆情调查与情报活动

1937年7月7日深夜11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双方军事冲突一直持续至8日上午,但当日北平当地各报均未明晰事情因由,大规模的新闻报道7月9日才开始。同一天,直属日本内阁的情报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媒体展开了有关事变的舆论和情报调查。委员会有关事变的调查资料数量惊人,仅1937年7月初至10月初3个月时间,资料就多达3000余件、20000多页、数百万字。其情报来源包括:(1)各部门获得的相关情报;(2)各部门提出的政策或意见;(3)同盟通信社的情报;(4)一般出版物的新闻信息^[1]。其中以最后一种数量最为庞大,是为日本政府有目的有组织的舆情调查。其内容涵盖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德国、比利时、荷兰、波兰、瑞士、芬兰、罗马尼亚、泰国、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埃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属海峡殖民地、英属印度、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种主要报刊(包括日本国内的3种英文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属印度支那、美属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18种广播;同盟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美联社、德通社、塔斯社、中央社等8家通讯社的电报等。

其多采用摘录或缩写形式对新闻内容加以归纳整理,每日或每三日向上呈报一次。

其中报纸调查范围最广,其主要由内阁情报委员会利用外务省在各国的外交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中国境内的调查对象包括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厦门、广州、香港等多个城市的主要报刊。事变初期,日本更关注事发地京津地区和南京的舆论状况。随着军事冲突趋于恶化,其对外军事干涉的可能愈发担忧,调查重点遂转向了沪、港等西方势力盘踞的城市。除《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国人报纸外,日本也非常关注在华的外国报纸的评论,其对《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晚邮报》(*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香港电讯报》(*Hongkong Telegraph*)等报的内容均有大段抄录。

国外报刊方面,共计调查美国报刊29种、法国20种、英国12种、德国8种、苏联4种,其他国家依情况数量不等。一些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大报,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泰晤士报》(*The Times*)等关于中日冲突的报道,调查基本做到了“有闻必录”,其他报纸则视观点是否新颖,有选择地摘录或缩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舆论调查不仅关注报道细节,更重视该国舆论的整体趋势。试举报告中对8月4日中国各报和7月16日德国各报的总结如下:

8月4日,中国各报聚焦于日军沿津浦线南下的消息。此外,中国各地各将领纷纷进京,一致发表支持抗日等内容。评论依然在强调全面抗战,但措辞颇为低调。此外,上海的英文报纸纷纷转变论调,劝告中国应尽力避免和日本全面冲突,这一现象值得关注^[2]。

7月16日,表面上德国政府对于日中两国持有同样的中立态度,其实是极暧昧的中立。德国报纸对于卢沟桥事变进行了较为自由的评论。经济方面的报纸大多持同情中方的论调,与此相对,纳粹党报依然重视东京方面的电报。一部分报纸对华同情恰恰体现了经济界及外交部对在华贸易的担忧。纳粹党希望签署《日德防共协定》后,日本能够暗中牵制苏联,同时也担忧东亚的动荡影响自身经济利益^[3]。

广播的监听任务主要由日本递信省承担。相比于报刊,广播的调查范围虽有所不及,但内容

更为丰富。日方对南京、上海两地的主要广播进行了全天候监听,时间连续性和内容完整性都较好。所监听的南京广播呼号包括XGNZ、SGNZ、ZONZ;上海广播呼号包括XGX、XOX、XHU、XRA。国外广播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美、苏两国,可能是限于地域因素,美国广播的监听集中在西海岸,苏联则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两地。此外,英国、法属印度支那、美属菲律宾的广播也有间断监听,但限于信号原因,监听效果并不理想。

通讯社的电报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同盟通讯社的电报,这些电报在原资料中绝大多数被打上了“绝密”或“不发布”字样,应是未能发表。从内容上看,它们也绝不仅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是所谓的“特辑情报”,即是外务省情报部以同盟通讯社的名义,通过无线电向驻外使馆通报的机密情报,其均由外交人员发送接收。其中内容涉及到了中日政府间的秘密谈判、社会动员、军事行动部署、与西方各国交涉等情况。

16日同盟社上海电(不发布):事变后,中国政府一直在力保金融界稳定。15日,财政部副部长徐堪从庐山飞抵上海,在中央银行召集20余名商界权威人士,说明了政府应对事变的措施,热切希望得到金融界协助支持。据早先12日确切消息,从上海启程的“拥抱加拿大号(Embrace Canada)”轮船载有财政部从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金库提出的2355万银元和价值200万元的银条,该批资金将经香港转运至英国伦敦或美国。上海地区未发行的5亿元纸币被运往洛阳、四川和香港等地,估计是担心突发状况,提前把资金运到较安全地区保管^[4]。

来自日本政府各省的情报中,以内务省和拓务省的情报最为特别。鉴于两国的军事冲突可能直接影响日本社会的稳定,内务省对国内的民众情绪、政党动态和集会情况做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和监控,拓务省则在朝鲜和台湾等殖民地进行了类似工作。下面是卢沟桥事变发生9天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长向拓务省相关负责人发去的电报:

大部分台湾人民好像还不了解事变的全貌。岛内有识之士纷纷表示,以中国的实力无论如何也不是日本的手,希望政府拿出强硬措施彻底解决此次事件,但也有人担心中日开战势必引发

物价上涨,加重平民阶级的生活负担,所以希望和平解决。台中部分民众自发停办了城隍庙的传统祭典,把节省下的经费用于国防捐款。南京广播局正在用闽南话和北京话对台湾进行反日宣传,有部分岛内民众收听,当局正在努力寻求对策,迅速向民众传播正确消息,对收听者以及收听后散布流言者采取了紧急措施^[5]。

从以上调查内容不难看出,内阁情报委员会的舆论调查是基于媒体内容分析和社会情报收集于一体的,涵盖了外交、经济、社会动态、军事部署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这般数量庞大且巨细无遗的情报调查即使在现代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更遑论当年。如此处心积虑,日本政府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情报,内阁情报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和运作机制又是如何,在战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二 日本政府的战时宣传观和对外宣传方针

日本政府最早的对外宣传活动始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为了与其他国家军队协调,争取对华要求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外务省有计划地启动了一系列宣传和情报活动。明治时期日本的新闻通讯业孱弱,无法独立承担此项重任,所以,最初的合作形式主要是通过与西方通讯社签署协定获取战争情报,并由政府拨出机密费,用于收买通讯社,优先发布对日本有利的新闻消息^[6]。这种手法一度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彼时,日军以“文明的军队”形象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黄祸论”舆情,确保其他列强能在此战中保持中立。此后,尝到了甜头的外务省逐渐将对外宣传工作常态化,战后大量政府资金开始流向在华日系报刊和各国的亲日报刊。自1909年开始,外务省甚至开展了每年一度的中国报刊调查活动,以明确选择可以操纵的对象^[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依托宣传广泛动员民间力量参战,给日本带来极大震撼。日本对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战争宣传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其对英国以北岩勋爵为首的“对敌宣传部”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的“信息部”倍加赞赏,认为正是它们的宣传工作使德国坚固的战线从内部开始瓦解;而战争中德国的宣传部门始终各自

为政,缺乏统一组织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8]。这种将战争失败归结于宣传失败是战后的一股思潮,其影响甚广。那时人们普遍相信在有组织的宣传面前,受众成为被动的靶子,媒介则被认为是“注射针头”,盲目地对刺激作出反应^[9]。战争宣传的目的是明确的,即“通过消除或者转移敌人对一个交战国的仇恨,使之成为直接瓦解敌人斗志的武器”^[10]。日本几乎全盘照搬了西方早期的战争宣传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国家“总力战”(total war)的思想。该思想认为:现代战争在规模和动员程度上都超出以往,是比拼武力、经济力、思想力的总和,思想战应和武力运用紧密配合,以攻击、消磨敌军和敌国民的战斗意志为重点。在了解敌国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国民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其缺陷,击溃其抵抗意志或离间其与第三国的关系,而宣传正是实现思想战最为有力的攻击手段^[11]。所以,政府善于利用且能够完全掌控媒体至关重要。社会思潮的统一都要借助报纸为武器来实现宣传者的意图,推演内外时局也离不开通讯社情报的助力。无视它们的价值造成在国际上孤立被动乃至失去全世界同情的例子并不鲜见^[12]。

这种“宣传万能论”是法西斯主义对西方宣传理论有选择吸收的结果,它无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新闻机构扩散虚假新闻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反思,刻意选择了有利于集权统治和战争动员的部分。有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教训,日本较早就认识到了言论统制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意义,其认为,为了使战争机器最大程度发挥效能,形成动员宣传“一元化”势在必行。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内阁直属的情报委员会应运而生。它本质是一个兼具战争宣传功能的内外言论统制机构,其掌握舆论情报和社会动态,为制订其国内外宣传政策方针服务,并以宣传为战斗手段,配合武力战来实现军国主义侵略野心,成为所谓“思想战”的中枢。

卢沟桥事变爆发半年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寻求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的声明。该声明是在迅速打败中国的幻想破灭后,日本企图将战争推向长期化并诱降国民政府内媚日派的手段。第二天,内阁情报部(1937年9月内阁情报

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炮制了《对华事变的宣传方针大纲》,其正是以事变发生后不间断的舆论和情报调查为基础的。11条对外宣传总方针如下:

(1)为了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将采取必要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事态。干涉不仅会使形势恶化,且威胁各国自身利益。对于企图妨害我国行动的势力,将举全国之力予以消灭,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公正态度的国家,将与其达成合作。

(2)日本已下定决心,军民团结一致对外,无论事变持续多久都将毅然前进,从根本上解决此次危机,并已为此做好了万全准备。

(3)阐明如今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及政策,尽力消除各国误解日本侵略好战的印象。

(4)日本并无任何侵占他国领土的野心,也绝不敌视无辜的中国民众。

(5)中国的排外及容共政策是威胁东亚和平与列国权益的最大威胁。

(6)阐明中日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中日两国的互助合作是必然趋势。

(7)列国对中国的武器出口或经济援助等不利于解决争端和恢复秩序。

(8)具体细致地宣传中国历史上屡次失信且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及中国民族性中的残忍。

(9)揭露中国在此次争端中的实力损耗和内部动荡等实情。

(10)宣传此次事变中皇军所展现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占领区明朗化的情况。

(11)阻止英美形成抗日同盟并以孤立苏联为重点进行宣传^[13]。

在总的方针之下,情报委员会又将宣传任务细化,根据各国的实际国情和舆论动态,分别拟定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案。对华宣传方案共8项,总结起来主要包含4个方面。首先,强调以中国的实力抗战必败,日本有能力且已下定决心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其次,国际援助遥不可及,中国长期奉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将令东亚永无宁日。再次,以实例阐述蒋介石政府是军阀和财阀的联合暴政,其“排日容共”的错误政策,必将导致中国被完全“赤化”。最后,申明日本不敌视中国民众,任何军事行动也不以平民为目标^[13]。在

国民政府抗战节节败退,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其宣传方案中又加入了详细描述“蒋政权败退惨状”“占领区临时政府维持治安得力”等内容^[14],甚至还有针对海外华侨的宣传方案^[15]。

日本针对第三国的宣传方案更是投其所好、攻其软肋,旨在瓦解任何可能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势力。事变后,针对美国媒体不断报道日军在华暴行和美国国会争论启动《中立法案》的情况,日本对美宣传方案强调日军军纪严明,奉行人道主义精神;在上海冲突中,中国空军屡次炸伤美国军舰;启动《中立法案》只会使中日冲突持久化;等等。英国在远东有诸多殖民地和商业利益,而此时欧洲战云密布,皇家海军根本无暇东顾。其对英国宣传就强调日本在东亚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英国的远东政策始终需要与日本长期合作,并适时提醒其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历史,以此申明日本对华态度并无任何“不公正”,等等。对法宣传强调中国长期以来的排外历史。对德、意宣传强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远东格局的影响,以及共产党势力在中国不断渗透的情况。对德国的中立态度表明欢迎,强调对其必有经济利益回报;对意大利的善意支持表示感谢^[1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普遍抱有畏惧心态,日本借此强调自身是东亚反共的“坚实堡垒”,加倍污蔑共产主义革命,并明确以下几点为其反共宣传主旨:(1)共产主义乃“红色帝国主义”,是一种特定的侵略手段;(2)共产主义与日本国体无法相容,以此确立日本传统思想的坚固地位;(3)共产主义危害全人类福祉;(4)阐明防共协定(《日德防共协定》《日德意三国议定书》以及将来随着防共协定参与国的增加而缔结的议定书)的真实用意,促进防共阵营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强化^[16]。

在具体宣传方法上,日本也意识到既往对外宣传存在着财政预算被分割过细、只注重社会上层人士、形式过于偏向文字、机械照搬国内宣传、无视对象国国民的兴趣等问题^[17],提出了“对知识阶级的宣传方案与针对普通大众的方案应加以区分”,“国内外的宣传重点应加以区分”,“对文化团体、宗教团体、商贸业者等,宣传题目须尽可能地简明有力,贴合其生活文化”等具体要求^[13]。在内阁情报部下发的用于指导宣传工作的

小册子中,甚至对宣传用词、海报配色等细节都有指导标准,其宣传工作之细致让人唏嘘不已。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在国际上几乎孤立无援。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英、法等列强袖手旁观,德国更是中断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对华军事合作,汪精卫于1939年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叛国投敌,只有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有限的军事援助。在这段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外宣传所起的负作用不容忽视。在了解日本战时对外宣传方针的基础上,有必要探究这个“思想战中枢”——内阁情报委员会的来龙去脉。

三 内阁情报委员会的机构变迁

日政府整合宣传机关的最初想法是在国际舆论一致谴责其对华侵略的声浪中萌发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露骨侵略行为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忌惮。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

“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该声明被欧美各国认定为“亚洲门罗主义”,即排斥欧美国家,将远东单独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日本面临着被国际社会孤立的风险,而其政府的宣传工作却政出多门、杂乱无章。外务省有情报部,陆军省有新闻班,海军省有军事普及部,此外还有内务省的警保局和递信省的电务局负责新闻和通讯的审核。情报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对以前宣传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过总结:

国家向国内外发布的新闻本应秉持公正准确为原则,但由于各部门皆站在自身立场上发布消息,导致每个部门的判断都过于片面,难以从全局出发得出综合性的结论性意见,如此恐对内误导舆论,对外招致他国对我国政策的误解。今后国家不仅要利用内务省的“出版警戒权”或递信省的“通信警戒权”来消极地维持治安,更要积极地对信息的发布进行国家层面的管控,以维护国家利益。基于此,从新闻内容到外交、内政等各方面,国家将更加关注各部门情报事务的联络调整工作,以保持情报的统一^[18]。

最初,是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提议重新整合分隶于外务省和军部的各舆情部门,以统一对外舆论口径。由外务省情报部的白鸟敏夫牵头,一个非

正式的临时机构“时局同志会”开始负责起联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相关人员,协调政府舆论工作,但其并无执行权。1936年7月1日,在原“时局同志会”的基础上官方机构“情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情报委员会设立之初也是非常设机构,17名委员分别来自外务省、内务省、递信省、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司法省、文部省、农林省、商工省、铁道省和拓务省,由各省次官和相关部门局长兼任。委员长则由内阁书记官兼任,配有常务事务官3人、书记4人^[19]。此时,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凡与国策相关的各种情报,各部门需及时向委员会通报;地方部门向本省及相关部门通报的消息须同时向委员会通报。(2)各部门负责人在发表与国策相关的声明时,须提前将发表内容通报委员会。(3)各部门在实施与国策相关的宣传时,包括发行小册子,播放演讲、广播、电影、戏剧时都须将宣传内容事先通报委员会^[1]。其中关于国策发表提前沟通和发行小册子等相关规定,明显是针对以往陆军省在侵华过程中擅自印行各种小册子,解释所谓“事实真相”,以致造成外务省一时慌忙应对又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的。由此,一个集情报收集、舆论审查、

战争宣传为一体的言论统制机构已初见雏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关事务骤然增多。1937年9月,内阁情报委员会改组为内阁情报部,成为政府常设机构,下设常任书记官5名(后增为书记官6名,情报官7名),属员17名(后增为32名)。书记官从各相关部门的高等官员中选出人员,可由内阁任命为情报官,负责情报、报道以及启蒙宣传等事务^[20]。在随后的机构整改中又细分为4个课室:第一课,负责文书、企划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相关事项;第二课,负责内外报道调整及新闻杂志用纸委员会相关事项;第三课,负责情报收集相关事项;第四课,负责宣传启发及《周报》编辑相关事项^[21]。

由于此次扩编仍不能满足日本政府言论统制的需求,1940年12月,近卫内阁再次将情报部升格为内阁情报局。除保留原有委员会的协调功能外,常务组织进一步大幅扩编,功能也更加细化,最终发展成一个下辖五部十五课的庞大机关。据日本政府的规划,原有的舆情调查及情报收集任务由第一部完成,第二、三、四部负责国内思想战的各种事务,第五部主要负责对外宣传^[22]。其具体机构设置分工和历任长官、次长如图1、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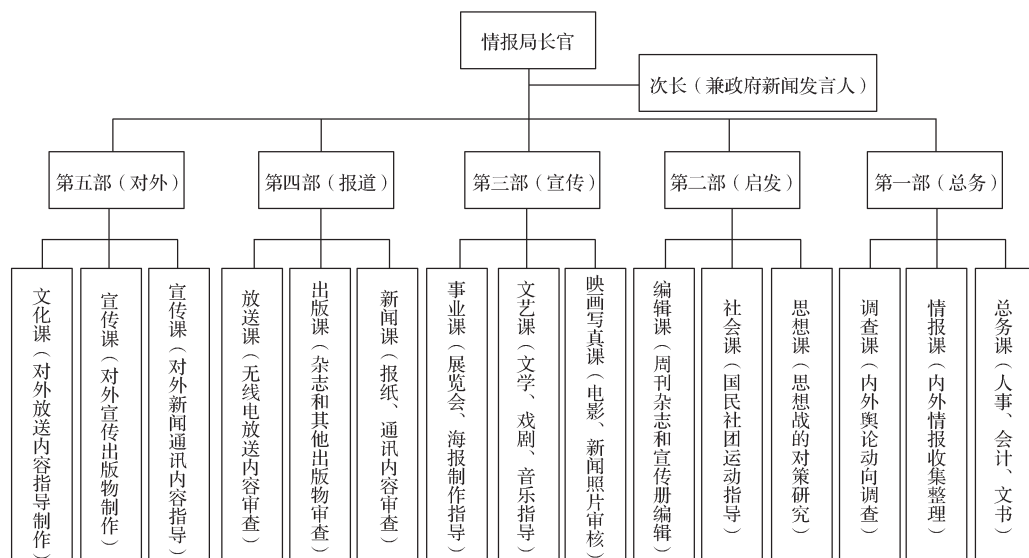


图1 情报局机构设置

表1 历任情报局长官、次长及其任职年限

历任情报局	伊藤述史	谷正之	天羽英二	绪方竹虎	下村宏
长官	(1940.12—1941.10)	(1941.10—1943.4)	(1943.4—1944.7)	(1944.7—1945.4)	(1945.4—1945.8)
历任情报局	久富达夫	奥村喜男	村田五郎	三好重夫	久富达夫
次长	(1940.12—1941.10)	(1941.10—1943.4)	(1943.4—1944.7)	(1944.7—1945.4)	(1945.4—1945.8)

此外,情报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继承了原外务省和陆军省在世界范围内完善的情报系统。1936年,有外务省背景的日本新闻联合社和有陆军省背景的日本电报通讯社合并为统一的国家通讯社——同盟通讯社,也由情报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同盟社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迅速扩张,至二战初期已建成了包括日本国内5家分社、国外44个情报局,拥有上百个通讯所的庞大新闻通讯网^[23]。从情报委员会的解密材料中也可以看到,该社还承担了部分海外情报的收集任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新闻机构的工作范畴,其多少具备了一些谍报机关的功能。这种新闻机构“间谍化”的现象,是法西斯政权控制新闻业的一种极端手段。加之统合拓务省、内务省、递信省、铁道省、商工省的力量,其发展至内阁情报局时已形成了主次分明、各有侧重的情报侦测网。1939年,内阁情报局的职能中又加入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般事项”,其“思想战中枢”的地位至此也就完全确立下来了。

在内阁情报局的授意下,日本新闻出版界还成立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日本文学报国会”“日本出版会”等所谓“民间组织”。这些外围组织作为情报局监管媒体的“触手”和“爪牙”,负责宣传方针落实执行。就这样,所有新闻及出版物在接受官方检查之前,也要进行严格的言论自检,军国主义对国内外舆论的控制形成了“外监内管”的独特现象。有学者曾指出:日本国家言论统制“一元化”的过程,就是将原本存在的“消极的媒体统制”与稍后兴起的“积极的情报宣传”两者构成的传播控制网络逐渐稠密化,最终由内阁情报局这样一个功能性机构统合起来的过程^[24]。

二战时期日本政府的一大特点是:国家机关均为军队所渗透,这是军国主义的终极表象,宣传机关也不例外。情报委员会原是以外务省班底为主体而组建的,所以军部在参与委员会的同时,陆军省保留了报道部,海军省也保留了军事普及部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随着委员会内军职人员不断增多,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已占半数。拥有审阅权的第四部、第五部部长更是长期由陆、海军少将担任。至1945年上半年,军队宣传部门和国家宣传机关完成合并,此时距日本战败只有几月之

遥。日本投降后,内阁情报局于1945年11月被盟军司令部强令废除。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25]。内阁情报局不仅是负责收集情报、管制媒体行为、引导舆论和对思想文化实施统制的核心机构,也是舆论动员体制的领导中枢^[26]。其言论统制的“一元化”是将原本用于应对战争的宣传手段,变为发动战争的动力源泉。回顾其历史,伴随着侵略战争步步扩张,经由“时局同志会”而“内阁情报委员会”,“内阁情报部”而“内阁情报局”之变迁,内阁情报委员会最终发展成一个集情报收集、媒体管控、舆论引导为一体的战时言论统制机构,其舆情调查洋洋数百万言不可谓不壮观,其言论指导方针巨细无遗不可谓不缜密。一方面,在战争初期,内阁情报委员会的一系列手段频频得逞,证明了战争宣传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人类大同的崇高理想和自身侵略扩张的野心混为一谈,其战争宣传最终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情报委员会在“膺惩暴支”的叫嚣声中诞生,在战争的废墟中走向灭亡,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

参考文献:

- [1] 情報委員会事務規程ヲ定ム[G].日本国立公文書館(类01946100,011),1936-06-18.
- [2] 支那事變に關する各國新聞論調概要[G].日本国立公文書館(A03023912900),1937-08-07.
- [3] 北支事變關係情報綴[G].日本国立公文書館(A03023869300),1937-07-17.
- [4] 北支事變關係情報綴(特輯情報87號)[G].日本国立公文書館(A03023869300),1937-07-16.
- [5] 北支事變關係情報綴(臺灣總督府電)[G].日本国立公文書館(A03023869300),1937-07-16.
- [6] 大谷正.近代日本對外宣戰[M].東京:研文出版,1994:296.
- [7] 許金生.宣傳戰的前奏:近代日本在華報刊定期調查活動探析[J].江海學刊,2015(3):170.
- [8] 內閣情報部.近代戰と思想宣傳戰[M].東京:內閣情報部,1937:11-12.
- [9] 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傳播學簡史[M].孫五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9.
- [10] 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M].張潔,田青,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39.

- [11] 若杉浪雄. 宣伝省を創設論せよ [M]. 东京: 东亚国势调查所, 1939: 1.
- [12] 大林一之. 國策統制論 [M]. 东京: 明德会出版部, 1928: 236.
- [13] 支那事変に対する宣伝方策大綱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资 00327100, 003), 1938-01-17.
- [14] 時局宣伝處理に関する件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资 00327100, 007), 1939-08-20.
- [15] 對華僑宣傳方針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资 00327100, 005), 1939-06-13.
- [16] 防共に関する宣傳方策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资 00327100, 002), 1937-11-29.
- [17] 栗屋義純. 戦争と宣伝 [M]. 东京: 时代社, 1939: 206-207.
- [18] 情報委員會ニ関スル件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纂 02186100, 017), 1936-06-19.
- [19] 朕情報委員會官制ヲ裁可シ茲ニ之ヲ公佈セシム [N]. 日本政府官报(第 2848 号), 1936-07-01.
- [20] 朕情報委員會官制改正ノ件ヲ裁可シ茲ニ之ヲ公佈セシム [N]. 日本政府官报(第 3220 号), 1937-09-25.
- [21] 内閣情報部分課規程 [N]. 日本政府官报(第 4019 号), 1940-06-01.
- [22] 内閣情報局機構案 [G].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情 00053100, 003), 1940-09-07.
- [23] 伊藤正徳. 新聞五十年史 [M]. 东京: 鱒书房, 1943: 423.
- [24] 孙继强. 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 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23(5): 113.
- [25] 阳海洪, 赵亚丽.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3): 73.
- [26] 于 森. 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舆论动员机制分析: 起源、构建与社会基础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19(1): 51.

责任编辑: 黄声波

.....

(上接第 102 页)

- [15] 余凌云. 行政法讲义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277.
- [16] 刘 权. 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 [J]. 中国法学, 2014(4): 133-150.
- [17] 马 迅, 杨海坤. 行政约谈实效性的保障机制建构: 兼论约谈法治化进阶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84.
- [18] 胡 明. 论行政约谈: 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视角 [J]. 现代法学, 2015, 37(1): 24-31.
- [19] 王贵松. 食品安全约谈制度的问题与出路 [J]. 食品工业科技, 2012, 33(2): 47.
- [20] 李梦露. 行政约谈问题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大学法学院, 2019: 30.
- [21] 孟强龙. 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 [J]. 行政法学研究, 2015(6): 115-116.
- [22] 汪太贤, 陈应珍. 环保督政约谈的祛魅与重塑 [J]. 河北法学, 2018, 36(11): 40.
- [23] 王延振. 行政约谈制度的法治化研究 [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18.
- [2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7.
- [2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EB/OL]. [2020-10-05]. http://news.youth.cn/sz/202002/t20200205_12186394.htm

责任编辑: 陈 璐